

①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研討會）

②

國際魯迅研究會第一屆學術論壇(北京論壇)

③

服務機關：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

姓名職稱：蔡輝振 教授

派赴國家：大陸北京

報告日期：2013 年 03 月 25 日

出國時間：2012 年 11 月 08 日～12 日

摘要

本次北京中國傳媒大學之行的目的有二：一為與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張鴻聲院長洽談學術交流事宜；二為於會中發表論文。前者初步達成協議，與我所建立學術交流管道，有關細節再做會商，本所 2014 年所舉辦之國際漢學學術研討會將邀請張院長前來，如果細節會商順利，便可簽訂交流協議。後者本人發表了「魯迅數位博物館之建置」，並獲得大會肯定。

本次「國際魯迅研究會第一屆學術論壇(北京論壇)」，由國際魯迅研究會主辦，由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與北京魯迅博物館承辦，邀請來自世界各地十餘個國家之魯迅研究專家學者共聚一堂。台灣則由本人與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陳建忠助理教授做為代表。

會中各自詮釋個人研究魯迅的心得，相互分享，尤其是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看法，彼此之間借鏡取法，收穫良多，增進國際視野。

本人並被邀為大會主持人。

目次

一、目的	4
二、過程	4
三、心得	7
四、建議事項	18

一、目的：

本次北京中國傳媒大學之行的目的有二：一為與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張鴻聲院長洽談學術交流事宜；二為於會中發表「魯迅數位博物館之建置」論文。

二、過程：

2012年11月8日至11日，由國際魯迅研究會、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共同主辦，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承辦的國際魯迅研究會第一屆學術論壇在北京隆重召開。來自國內外各高校、科研院所、出版機構等的約50位學者與會。會議的中心議題為“世界魯迅與魯迅世界：媒介、翻譯與現代性書寫”，本次會議首次集合了國內外的知名魯迅研究者，是魯迅研究的一次盛會，對魯迅研究而言具有重大意義。會議的內容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魯迅的再認識

嚴家炎（北京大學）作了題為《魯迅心目中文藝家的時代使命》的發言，嚴先生從魯迅的兩次演講——《關於知識階級》、《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展開論述。嚴先生認為，魯迅心中的文藝家和知識份子的時代使命，是要從事“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催促社會進化”，推動民主法治，對當政者盡到監督的責任。嚴先生通過舉出一系列史實說道魯迅並不只與國民黨專制對立，與共產黨之間也存在矛盾。最後嚴先生說，革命根據地同樣需要啓蒙，如果當年魯迅所說的“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能夠深入人心，那麼就不會有後來慘痛的歷史教訓。

劉中樹（吉林大學）作了題為《對作為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魯迅的再認識》的發言，劉中樹認為將魯迅定位為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最完整和切實的評價。提出該定位評價問題是因為，一直以來中國現代文化思想歷史上對魯迅的評價褒貶不一。進行魯迅研究應從魯迅活動的歷史時代全面深刻的把握魯迅的世界觀、人生觀、學術品行等一系列問題才能夠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最後，劉先生提出了自己對魯迅的定位，並從四個方面進行了解析。即1，魯迅的社會歷史發展觀、為人生的改良人生和改造社會的使命感和社會革命活動。2，改造國民性“立人”的民族復興的藍圖和目標。3，為人生和改良人生的文學創作主見和成就。4，獨立自主、愛恨分明、不妥協的鬥爭精神、自我解剖的人格以及“拿來主義”主張。

張釗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在《打倒“孔家店”的“摩登”聖人——魯迅對孔子和儒家的複雜態度》中認為，首先，魯迅對孔子及儒家並未徹底否定，相反還在不少文章中表達了他對孔子及其學說的好感。並且，魯迅的某些主張與儒家思想有契合。其次，魯迅對《二十四孝圖》的分析有褒有貶。對不合常理的“哭竹生筍”、“臥冰求鯉”等大加批判，從“誠”的角度揭露其虛偽和桎梏。再次，魯迅對孔子和儒家的批判是經過歷史分析的。他並不是簡單的反對儒家思想，他批判的目標是利用儒家謀取私利的“聰明人”，抨擊那些尊孔者的虛偽性。最後指出，魯迅不是完全贊

同儒家的全部，有肯定也有批評。他認為儒家禮教是吃人的禮教；“聰明”已成儒家主流和“愚人”的不成氣候，使得魯迅對儒家理念和實踐失望。

孫郁(中國人民大學)在《魯迅對文學批評的另一種理解》的發言中認為，魯迅眼中的批評有兩種——作家的批評和理論家的批評。其中，理論家的批評又分為“非馬克思主義”的和“馬克思主義”的，而在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中，又有“列寧主義”的和“非列寧主義”的。魯迅欣賞作家的批評，而對理論家的批評，尤其是中國理論家的批評文字有些保留。針對“非列寧主義”的批評觀，魯迅也非常欣賞。同時，魯迅的批評觀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其思想裡的馬克思主義批評觀沒有系統性，只是被壓迫者覺醒後爭取自由的精神的閃現，以革命者的身份追問歷史追問文化。所以，魯迅的“遠離權力”的批評觀，和後來權力影子下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批評觀有本質的區別。簡單地以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來解釋魯迅，忽略魯迅內心深處另一種批評觀，就導致了對魯迅片面性的解釋。

鮑國華(天津師範大學)的《從學術史視角看魯迅的中國文學史研究》從兩個方面探討魯迅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一是對魯迅學術研究的有效定位問題。其著作《中國小說史略》在西方小說的參照下，不固守西方小說概念，從中國文學自身發展的規律入手，探討在中西交匯之間給中國的小說和小說史進行定位。二是魯迅的學術文本在其文學世界中的地位。從魯迅小說的創作時間看，《吶喊》到《彷徨》從題材、藝術處理上都出現明顯的變化，在其間完成的《中國小說史略》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由此可見，魯迅的小說創作，支撐了其對小說藝術點評；對小說史的研究，反過來又促成其小說創作的變化。

二、魯迅世界與現代性

顧彬(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國際魯迅研究會顧問)《魯迅的現實性》的發言，從文學性和現代性的角度對魯迅作品進行了分析解讀。重點分析了魯迅作品中的聲音問題。顧彬認為，魯迅小說中的聲音值得懷疑，從他小說中聽到的並不是真正的魯迅的聲音，只是一個修辭格。顧彬將作品中的聲音大致分為四類，即1，真正的作者的聲音，但是這個聲音不能全信，因為作者可以否定他自己的作品。2，敘述者的聲音，例如《孔乙己》中的孩子。3，內在作者的聲音，例如《孔乙己》中的孩子的聲音是不可靠的，而應該尋找作者真正的聲音。4，作品主人公的聲音。並以“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為例，具體分了析“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幾聲”是一個孩子的聲音，“所以至今還記得”是一個大人的聲音。

汪暉(清華大學)的《魯迅文學的誕生——讀〈吶喊〉自序》通過對《吶喊》自序的文本分析，以及對竹內好的對魯迅的闡述進行分析來探討魯迅文學的誕生，認為自序作為回憶性散文並非紀實而是追憶，含有重構成分。汪暉認為魯迅被動、內斂即魯迅擁有“寂寞的能動性與吶喊的被動性”，隨後探討了魯迅是通過對“異路”、“異地”與“別樣的人們”的尋求開始了自己的“吶喊”的，同時質疑了魯迅文學的起源是“幻燈片事件”，並認為魯迅“反抗絕望的文學”與“樂觀的文學”不同，他

拒絕樂觀主義並試圖在寬廣世界中探索通向未來的道路。

劉勇(北京師範大學)在《魔幻與現實--從魯迅到莫言》的發言中將魯迅與莫言聯繫在了一起。劉勇談到，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國內外學者就其作品究竟是以“魔幻”為主，還是以“現實”為主，產生了分歧。劉勇認為，問題的關鍵是，魔幻與現實、想像與歷史，在文學中是同在的，從古到今，也是中國與西方共有的。文學中魔幻的應用在中國存在深刻的淵源——魯迅、老舍、沈從文等五四作家、莫言等當代作家的作品都存在揭露現實、重構歷史的雙重取向，以及對魔幻想象等表現手法的多種探索。而在中國古代作品中，《世說新語》、《三國演義》、《聊齋志異》也都表現了魔幻與現實之間的雙重取向。這說明莫言並非照搬西方，而是深受中國固有的文學土壤的滋養。

在《文學與尋根》的發言中，王乾坤（華中科技大學）為對“尋根文學”做總體性判斷，想到魯迅是不是“尋根文學家。王乾坤認為，魯迅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尋根文學家，而是一個尋找終極著落點、尋找生命之根的文學家，並力圖將其還原成一個民族的或宗法的東西。魯迅擁有世界性的品格，魯迅以其超越啓蒙的態度有別於中國其他啓蒙者，對“民主”、“科學”和“宗教”的態度也別具一格。這種別具一格也體現在魯迅對“自由”的態度上，他看到了民主與自由天生的對立關係，因而與胡適等產生了質的區別。同時，魯迅還具有“居間性”，他不會完全信任一種觀念，也不對自己完全信任，時刻警惕自己與惡勢力合謀的可能性。魯迅終其一生都致力於尋找民族的根。

李寶暉(韓國江源大學)的《中國現代性的一個綱領“救救孩子”——以優生學的角度來談》從另一個角度對魯迅的作品進行瞭解讀。李女士認為正是因為魯迅遭遇了“既非贊同，也無反對”的寂寞境地及其內面世界的對立即對歷史的懷疑、對進化論的滅種恐怖或對中國現代化的懷疑導致了其“救救孩子”的命題中有一種憂鬱的氣氛。隨後李女士又探討魯迅與優生學的關係，介紹了當時的知識份子接受優生學的背景。最後詳細闡述了“適者被不適者吞噬”的現象在文本中的表現。並說明，魯迅在接受優生學的過程中，對極端優生學保持警惕，主張優生學和命運論不可混為一談。

金河林(韓國朝鮮大學)在《魯迅思維模式探究--以〈野草〉為中心》的發言中認為，魯迅是一個主張抒情的詩人，並不是一個客觀的、多方面的小說家與思想家。通過對文本的分析，金河林認為魯迅的思維模式由三部分構成：以《狂人日記》為例，可見魯迅既擴大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同時也深化對內部世界的認知；秉承傳統文化矛盾的思維模式，對傳統文化既傳承，又批判；三角形構造小說模式——一個人、民眾、社會。另外，魯迅常採用二層對立的方法，如“青年與老人”、“希望與絕望”，這種對立有助於讀者明確地把握作品內容與主題。

何錫章（華中科技大學）的《論“五四”啓蒙思想裂變的三種主要走向、原因及其巨大影響》認為“五四”退潮後形成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政治與社會革命、胡適

為領袖的思想方法為主的思維及其工具的革命和魯迅所堅守的思想革命三種走向。何錫章從傳統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他們分化與裂變的原因：他們當初並未按照中國傳統的立足於具體利益的共同體原則結合在一起，自身也擺脫不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小團體主義”主義，其自身的思想特點也與傳統文化脫離不了干係。最後探討了陣營分化裂變的影響，重點論及消極影響即五四啓蒙思想被打斷而至今未能得到廣泛有效的傳播。

林曼叔(香港《文學評論》)的《魯迅：中國現代自由主義者的風度及其命運》認為，魯迅的自由主義思想與深受西方學說和老莊哲學以及魏晉風度的薰陶相關。他是一個不受任何思想束縛的自由主義者，他的思想沒有體系，自身也拒絕被納入集團黨派之中，而是選擇不斷探索前進。他與其他學者的論爭也體現了其作為自由主義者的特點。最後提出自由主義者的存在有賴於社會的開放與活躍，同樣，自由主義的活躍也有助於社會的發展。

李怡(北京師範大學)在《魯迅——現代中國文化之“結”》中認為魯迅是現代中國研究繞不開的“結”。首先，魯迅是一個“兩級牽掛”，他不僅曾被國共兩黨爭相讚頌、吹捧和利用，還曾被創造社、太陽社的青年、林語堂及八九十年代對魯迅持懷疑態度的青年學者做出歷史低谷的評價。其次，魯迅自身有意成為歷史繞不開的“結”。他在人格上的叛逆性、獨立性和在文學創作上的自我“世故”的獨立性都顯示了這一點。最後，其作為現代文化之“結”的意義表現在中國思想的世紀性變遷、中國現代政治革命的理想與選擇、中國現代文學觀念的發展、中國現代倫理觀念、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壇的複雜糾纏關係等五個方面。

湯山土美子(日本成蹊大學)的《通過“孩子”相關的詞彙再談魯迅五四時期的思想特徵與意義--〈狂人日記〉“吃人的世界”的結構與兒童觀》認為“孩子”及其相關詞彙是構成魯迅思想的重要元素，對理解魯迅而言有重大意義。然長久以來，人們只關注到了魯迅對於民族未來的“孩子”的深厚感情和強烈的責任感，卻並未關注“孩子”及其相關詞彙所蘊含的思想性意義。文章從《狂人日記》入手，詳細解析了“孩子”及其相關詞彙在文本中的不同存在形態，對五四時期魯迅的家族觀及兒童觀進行分析，從而析出魯迅所說的“性別與輩份的等級制度”下中國的家族結構、以及作為社會性存在的兒童的特徵和意義，並對“孩子”的日文翻譯提出了意見。

李林榮(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發言《歧變與轉向：魯迅雜文寫作的 1926-1928》從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對魯迅的寫作進行了探討。首先，介紹了寫作這篇文章的方法論思考。其次，通過 1926-1928 年魯迅雜文寫作的整體概貌進行文本現象分析，以展示魯迅的思想變化軌跡。再次，魯迅的雜文體現了女師大風潮餘波後對自我認同的回歸，對破舊革命時代及其所帶來的高潮和文學、文學現象之間的辯論關係，以及魯迅與一部分狂飆社成員的徹底決裂等現象。最後認為，表面上魯迅在這一時期的雜文寫作顯示了其從自由戰士到左翼領袖的身份轉變，但實際上，他仍然是精神界孤獨的戰士。

夏可君(中國人民大學)的《魯迅的〈野草〉與現代文學的草寫性》認為《野草》體現了魯迅獨特的新的書寫性，他創造性地轉換了古代漢語，生成出一門新的白話文的新文字。夏可君認為魯迅《野草》的書寫性體現為如下幾個方面：語句三次打斷的書寫，而這種三次打斷的書寫，是爲了傳達個體的孤獨感。即刻幻化的書寫或者夢的書寫，這種即刻幻化的書寫，與個體的生命感受切身相關，與夢幻相關。圖像-文字-事物三者貫通的書寫。身體的書寫。野草式書寫。

田本相(中華藝術研究院)的《魯迅的現代性》認為，魯迅是近現代中國最早的現代性觀念的傳播者和宣導者。從四個方面進行了論述：第一，“立人”思想。魯迅呼喚精神界的戰士，講求精神。《文化偏至論》等著作都是突出體現。第二，小說的現代性——殘酷的美。揭示對精神迫害的殘酷性，揭示人的精神的悲劇性，如祥林嫂、閨土、阿Q等。第三，內在的矛盾與痛苦，《影的告別》即揭示了這種彷徨而未得的狀態，這就是魯迅甚至是五四知識份子的焦慮狀態。第四，最能體現魯迅現代性的即其批判精神和鬥爭精神，也就是現代性裡面的否定性。

劉春勇(中國傳媒大學)的《魯迅：留白與虛妄》抓住了魯迅文學創作的兩點——留白與虛妄來探討魯迅的文學世界。劉春勇認為魯迅在1925年就已經有了留白意識，其文章的寫法是一種反焦點的寫作。關於虛妄，希望其實不是傳統意義的希望，也不是絕望，而是虛妄。我們的生活其實就是一個虛妄的狀態。

三、魯迅與海外

高利克(斯洛伐克)在《尤裡烏斯·澤耶爾和魯迅作品中的後羿：一項比較神話學的研究》裡從比較文學的角度闡釋了魯迅的創作，比較了尤利烏斯·澤耶爾和魯迅兩位元作家作品中的後羿形象之間的關係。高利克先生認為澤耶爾和魯迅作品中的後羿形象分別取材於兩個不同版本的民間神話傳說中，他特別強調魯迅筆下的嫦娥和後羿的故事，魯迅的歷史小說是與現實有密切關係的，特別是魯迅當時在廣州的時候與許廣平的生活，包括我國的革命，這些構成了魯迅歷史小說中一些特殊的內涵。同時，高利克先生在論述中引用了很成功的材料，對《聖經》中的大胃王和中國古代編年史著作《左傳》中的晉文公這兩個重要的人物進行了全面的比較。

哈賽甯(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學)的《試論魯迅和納吉布·馬哈福茲作品中的知識份子形象》同樣從比較文學的視角出發探討魯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他認為，魯迅和納吉布·馬哈福茲分別作爲中埃文學史上的大家，都對知識份子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描繪分析。文章詳細分析比較了兩人筆下的四類知識份子形象，即：傳統知識份子形象；新生代知識份子形象；革命知識份子形象；女性知識份子形。哈賽甯認為兩位作家成功的塑造了鮮活的知識份子形象，同時把知識份子的出路作爲自己文學創作探索的重要方面，很巧妙的反映了兩位文學家的民族性和對自己本民族人民的關注，體現了作家深切的民族意識和憂患意識。

藤井省三(東京大學)的《松本清張的初期小說〈父系之手指〉與魯迅作品〈故

鄉》——從貧困者“棄”鄉的“私小說”到推理小說〈埋伏〉的展開》一文則將《父系之手指》(雜誌第一版和單行本版本)、《埋伏》與佐藤春夫翻譯的魯迅的《故鄉》進行了細緻的文本間的比較、考察。通過細緻的文本分析，藤井省三認為私小說式清張作品《父系之手指》，將《故鄉》的故事結構進行顛倒，站在相當於水生所代表的貧困者的人物視角，對相當於《故鄉》中的敘事者“我”及“我”的侄兒宏兒所代表的富者進行了批判。這種反魯迅，反《故鄉》的主題最終成就了松本清張最早的推理小說《埋伏》。這種比較閱讀不僅有助於分析清張文學從私小說轉向推理小說的展開脈絡，更有助於我們從新的角度對《故鄉》進行解讀。

莊華興(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的《六七十年代馬新華文雜誌中的魯迅》就從 60、70 年代間的新馬華文雜誌中探討魯迅的思想補給如何為新馬華人參與建國提供思想準備。在 60、70 年代的馬來亞獨立後建國時期，魯迅的影響不僅在於其人格和精神的典範，其思想也催生了馬來亞華人的民主與民權意識的萌芽。最後認為魯迅的(民族)國家意識是民族主義的，具有一定的相對性與排他性，這對海外離散華人尋求安身立命產生了借鑒與啓示作用。並呼籲不能簡單地以後殖民的視角看待魯迅與海外華人社會的關係，兩者的關係有進一步厘清的必要。

而朴宰雨(韓國外國語大學)的《魯迅精神的實踐性繼承在東亞：以竹內好、李泳禧、錢理群為中心》則從魯迅對東亞的影響的角度解讀魯迅。對日本的影響以竹內好為代表，對韓國的影響以李泳禧為代表，中國則以錢理群為代表，將受魯迅影響的海外知識份子分為 7 個類型，並介紹了其中的四種類型——思想家型、創作家型、研究家型和一般讀者型。認為思想家型不僅接受魯迅的精神內核和思想精髓，還付諸實踐，以李泳禧為例進行了詳細介紹。並認為，韓國的知識份子歷史與韓國的精神文化史可以從接受魯迅的角度重新闡釋。

同樣，洪昔杓(韓國梨花女子大學)的《金台俊的學問研究與日本人以及魯迅》以韓國學者金台俊的著作《朝鮮小說史》為著入點，談到金台俊在京城帝國大學學習的學習背景、創作《朝鮮小說史》的理論準備和思想契機，進而分析金台俊與日本人、與魯迅之間的學術關聯。洪昔杓認為，金台俊寫《朝鮮小說史》無疑受到了熟知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日本學者辛島驍所開的中國戲曲與中國小說課程的影響。另外，金台俊發表的《文學革命後的中國文藝觀》不僅積極地參考了日本人瀨沼三郎的論文，而且更多地參考了中國的資料，並基本完成對魯迅的理解，認為魯迅已盡時效。最後，洪先生總結，從《朝鮮小說史》比較文學的視角看，從金台俊受熟知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日本學者辛島驍的影響看，《朝鮮小說史》不僅凝聚了金台俊的獨立學術成就，也充分吸收了中日韓三方的學術成就。

與會學者不僅探討了魯迅對後人的影響更追溯了魯迅所受到的來自他國的學者或思想的影響。林敏潔(南京師範大學)的《魯迅與松本龜次郎》探討了魯迅與其日本老師之間的關係，她認為，旅居日本的 7 年時間裡受到的教育和影響是魯迅後來獲得偉大成就的原因之一，而其日文老師松本龜次郎則是其中的一個關鍵人物。文章從

介紹松本的生平著手，通過三個具體的事例求證了魯迅與松本之間非單線的互相的影響關係。最後指出，魯迅與松本龜次郎之間已經超越了指導與被指導的關係，他們之間是建設性的、相互影響的、教學相長的關係。

而陳漱渝（前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在《魯迅的蘇俄觀》則探討了魯迅的蘇俄觀，他認為魯迅的蘇俄觀在其後十年的思想創造中有著重要的影響。針對魯迅的蘇俄觀，在以往研究中存在兩種說法：一是嚮往說，即對蘇俄的嚮往。二是質疑說，即對蘇俄理想的幻滅和警覺。陳漱渝認為，魯迅的蘇俄觀是有局限性的。首先，回歸到時代背景下，魯迅對托洛斯基被槍斃等消息有一些瞭解，他認為人權的保障和生產力的解放這一理論是正確無疑的，然事實並非如此簡單。其次，魯迅有著“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狹隘觀。但是，魯迅的人道主義精神令我們受益匪淺，當代人應向其學習具有深邃的歷史眼光和厚道、公正的寫法。

陳建忠（清華大學）在《論冷戰年代裡夏濟安的魯迅研究》的發言中認為，夏濟安、夏志清作為冷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的海外研究者，他們的研究意義是複雜的，其論述需要加以整理。首先，二戰之後，中國現代文學在海外的發展需要置於區域研究的脈絡裡重新加以理解。因為冷戰學術的影響，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所以該成果與該基金會的傾向正面相關。第二，二夏其實是海外流亡離散論述的代表。二夏認為魯迅並不是五四精神的代表，而是一個“病態的天才”，這是透過魯迅談論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一種方式。第三，二夏採用新批評的方式研究中國現代文學，肯定張愛玲、錢鐘書、沈從文，而否定左翼文學和魯迅。最後認為，在海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處於冷戰文化脈絡裡，受到了冷戰學術思維的影響，缺乏自由自覺的主體性。

四、關於魯迅的翻譯

朱正（湖南人民出版社）在《談魯迅的翻譯》的發言中認為，翻譯在魯迅的文學活動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魯迅的創作受其翻譯的影響很大，其文章中的有些話來自於翻譯而並非自己最先提出來的。魯迅是主張“直譯的，朱正認為魯迅的翻譯達到了“信”的要求，但是“達”則出現了問題。所以，魯迅雖是一名勤勉的翻譯家，但是對他的翻譯著作不能做過於肯定的評價。

寇志明（奧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在《翻譯魯迅的〈摩羅詩力說〉：“源”文本和意譯與直譯的兩難》中認為，《摩羅詩力說》中含有一些源於西方著作的引文，但是魯迅並沒有說明這些引文的出處，寇志明就如何找到原文本以及魯迅的翻譯與原文存在的明顯出入，如何把原文清晰而準確的翻譯成英文，以及魯迅本人對原文本的理解進行了論述。

張中良（中國社科院）在《魯迅的兒童文學翻譯》中認為魯迅的兒童文學翻譯對於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學自覺和文體獨立及魯迅自身創作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他主要從三個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首先講到魯迅翻譯兒童文學的階段進程。分別以

1903-1921年、1922-1927年和到上海後的九年間分別進行了論述。接下來張中良談了魯迅翻譯兒童文學的選擇眼光。他說，魯迅的文本選擇歷程和世紀初到30年代的社會歷史文化進程完全契合，其選擇翻譯的兒童文學不僅可以體現童心童趣和人與自然和諧的作品，還表現出其社會性寄託。最後，張中良談了兒童文學翻譯和兒童文學對魯迅創作的影響。魯迅不僅從兒童文學中借用了大量意象投入自己的作品，而且兒童文學自身也影響了魯迅的創作，同時魯迅對兒童文學形式的也有一些借用。

王錫榮（上海魯迅紀念館館長）在《20世紀中國的普羅米修斯--魯迅的譯介工作》認為，魯迅真正有意識的文學活動從譯介工作開始。魯迅的譯介觀念是，在引入和翻譯外國文學的同時把中國的文學創作介紹給世界，引入西方的先進文化觀念並把中國的精神文化成果傳播到世界讓世界瞭解中國。其譯介生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在日留學時期。這一階段的特點主要表現為直譯、文筆古奧和選擇弱小民族作品進行譯介，其中直譯在當時具有革命性意義。第二階段是北京時期，這一時期魯迅借翻譯來取今復古、別立新宗，努力尋求建立中國新文學的新道路。第三階段是魯迅在上海時期，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主要是譯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而後期則著力收納新潮，脫離舊套，開始創造全新的中外文化交流局面。

五、魯迅與左翼文藝

解志熙（大陸清華大學）的《論“胡風與魯迅的精神傳統”問題及左翼文學之分歧》通過史料進行分析，認為從周恩來和胡風在1945年10月重慶舉行的魯迅逝世九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中可以看出周對胡有委婉的規勸，並認為胡風之所以“不大與人為善”是因為他的“仇恨”心態和“戰鬥”願望，這種心態和願望則不僅源於對魯迅的性格氣質的認同，也源于胡風的注重思想精神革命輕視社會政治革命。隨後胡風發起了一場文壇整肅運動，“主觀戰鬥精神勝利法”也由此而產生。最後認為“胡風集團”冤案的成因與左翼文學運動的終結與為文藝鬥爭缺乏足夠寬容自由的爭論空間與和而不同的文化制度有關。

李繼凱（陝西師範大學）的《延安媒介與魯迅--“魯迅”與延安文藝的結緣及其他》梳理了魯迅與媒介之間的關係，引入影音的概念進入魯迅研究領域。在中國，影音被詮釋為文化基因，也有人直接界定為影音，是估量一個人價值的參照系。期刊、電訊、電視是考察魯迅生前死後與媒介關聯的重要途徑，李繼凱從中發現了三種關聯：第一，“人為媒”——魯迅的影音及其精神生命。魯迅研究者就是人為媒的主要體現者，依賴研究者的堅守和闡釋，魯迅的影音才能得以彰顯。第二，“在延安”——符號化、媒介化的魯迅。通過魯迅作品的編印、傳播、閱讀、研究及紀念活動可以看到魯迅與媒介的密切關聯及其影音力量的呈現。第三，“魯莫言”——舊媒體與新媒體的力量。魯迅與莫言的比較研究對中國文學、文化，乃至於現當代文學專業，具有學科專業建設的意義和價值。

閻晶明（《文藝報》）在《魯迅為什麼“頌蕭”--談魯迅與蕭伯納訪滬》的發言中認為魯迅與蕭伯納之間仍有研究價值：蕭伯納訪問中國與魯迅等人在一起的八個小時

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影響力，超過迄今為止任何一個外國作家；魯迅和蕭伯納在同一個時代、不同的地方所起的作用是相同即揭露虛偽；二者對諸多事物的看法非常一致，比如對於長城及對莎士比亞的看法。

在《重讀〈為了忘卻的紀念〉》中，張業松（復旦大學）力求通過文本的細讀和史料梳理達到分析魯迅風格和魯迅氣氛的來源及內容的目的。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了探討：一是魯迅在左聯五烈士事件發生後的第一反應及對事件的歷史定位。二是魯迅與五烈士的重要成員的個人關係。三是魯迅個人思想的反思與表達，梳理了魯迅在左聯五烈士以及左翼問題上的立場。張業松認為魯迅將這一事件擴大到整個中國進行思考——弱者、社會底層階級、青年的被扼殺意味著國家的前途危機，由此，魯迅的左轉跟魯迅的總體想像是密切相關的。

蔡震（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的《於細微處看歷史——從魯迅書賬中的郭沫若著作說起》從郭沫若研究的角度看魯郭二人的關係。一般的文學史敘述中二者總是處於“筆墨相讎”的情境裡，而從一些歷史細節中可以看到二者不為人知的關係。蔡震認為魯迅生前購買了郭沫若所有已經出版的古文字研究著作，這表明魯迅看重郭沫若的古文字領域的研究，與郭沫若具有共同的學術興趣，而不是為了與郭沫若打筆墨官司而買下這些書。由此可見，歷史的真實，未必不存在於歷史的細微末節處。

石天強（北京航空航太大學）的《組織化與非組織化——魯迅的個體敘述對左聯非組織化的意義》從思考個人和一個嚴密的黨的結構之間的關係，一個結構對一個人的改變引申來思考魯迅和“左聯”之間的關係。石天強認為在一開始魯迅是高於“左聯”而存在的，隨著“左聯”的發展，出現的一些矛盾則因為瞿秋白的存在而得到了解決，這便是一個如何解決非黨人士和黨的組織之間的問題。而且，魯迅是處於“左聯”結構之外的保持個體獨立的非馬克思主義追隨者的知識份子，石天強認為，這也是現代都市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份子基本生存方式。魯迅的這種獨立性使得自己在思考問題時不受制約，對“左聯”也構成了制約並形成了雙重領導體制。

六、魯迅研究之研究

在《論魯迅及其研究出現的歷史根源--關於魯迅學的哲學追問》的發言中張夢陽（中國社科院）沿著何兆武先生的思路對魯迅學進行了一番哲學的追問。有四個方面的追問，一：魯迅值不值得研究？魯迅畢生致力於對國民性的改造，這是他恒久的、普世的價值。知識份子應當抓住現在的機會，潛心研究，構建精神之塔，達到理性之界。二，應該以什麼方法研究魯迅？研究魯迅不能將之偶像化，意識形態化。應打破舊的思維方式和論證方法，趨近魯迅本體，汲取真諦和智慧。三：為什麼要將魯迅研究上升為魯迅學？魯迅學的性質是科學形態魯迅研究的的學科化形態，學科化就是發揚求真求實的宗旨，使魯迅研究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四：魯迅學能夠持續下去嗎？魯迅學能夠作爲非“顯學”的形態持續下去，作魯迅研究應保持邊緣姿態。

黃侯興（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的《魯迅研究五十年》重點論及認為魯迅與郭沫若

的比較研究。他認為二者其實是兩個時代的人，魯迅思想的前瞻性、對社會人生的批判精神、理論與創作的深刻性是郭沫若無法達到的。魯迅在五四時期不唱反帝愛國的主旋律，時常透露出反抗絕望的思想，但在郭沫若的作品中卻充滿了魯迅作品中所沒有的主觀浪漫精神。這種區別與他們出身環境、個人經歷相關。另外針對郭沫若作品中存在的問題，黃侯興認為是因時代環境所迫，有其歷史根源。最後，針對魯迅與郭沫若的研究，黃侯興希望專家學者不要帶有褒貶色彩，要歷史地、客觀地、多角度地研究。

在《沈從文對魯迅小說的相關論述》中，高恒文（天津師範大學）認為沈從文對魯迅小說的論述和現在對魯迅小說作品的定性不一樣。沈從文將魯迅的小說分為諷刺小說和抒情小說，並認為魯迅真正優秀的小說是抒情小說，例如《故鄉》，而對於《阿Q正傳》等諷刺小說的評價不高。但沈從文對廢名的小說評價卻非常高，認為廢名的小說在反映當時中國人民的生活現狀方面要高過魯迅。對此，高恒文認為原因有二：一，沈從文的作品創作是要重建民族品德，而魯迅的鄉村小說裡面勾畫的世界都是醜惡的，與沈從文的文學創作理念大相徑庭。二是沈從文個人非常欣賞廢名這種不同於魯迅諷刺小說的闡釋方式，並且這種看法在京派作家中很普遍。

姚小鷗（中國傳媒大學）的《人民文學版〈故事新編〉注釋的若干問題》以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年《魯迅全集》與 2006 年版單行本為主要依據來說明其中存在問題的注釋高達 20% 之多。姚小鷗指出問題主要存在於以下三個方面：一，技術性問題，如注釋序號位置不當，引用文獻斷句不當，引用文獻稱名前後不一等等；第二是引用文獻錯誤，文獻解釋錯誤，注釋行文不準確等學術問題；第三是政治及學術文化理念造成的解說問題。並分別舉出了實例進行了具體的分析。

葛濤（北京魯迅博物館）在《魯迅編輯瞿秋白的文集時的幾則集外文字考釋》中提出魯迅在編輯瞿秋白的文集的“編者釋”應作為魯迅的集外文字收錄到《魯迅全集》裡。魯迅對瞿秋白的翻譯進行了編選形成了《海上書林》，並對瞿秋白的譯文加了兩個注釋，並做了一個編者說明。所以，一些魯迅的“編者釋”應作為魯迅的集外文字收錄到《魯迅全集》裡，這樣便可以更好的感知魯迅。

本次「國際魯迅研究會第一屆學術論壇(北京論壇)」，由國際魯迅研究會主辦，由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與北京魯迅博物館承辦，邀請來自世界各地十餘個國家之魯迅研究專家學者共聚一堂。台灣則由本人與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陳建忠助理教授做為代表。

本人之〈魯迅數位博物館之建置〉論文，旨在探討魯迅數位博物館應該如何建置，並分為前言、建置內容、建置方式、建置範例，以及結論等五個單元。有關前言部份：說明魯迅數位博物館建置的重要性，有助於魯迅文獻的保存與傳播，尤其是可做永久性的典藏與延續，並透過網際網路(Internet)無遠弗屆的傳播世界各地，達到資源共建共享的目的，這是時代趨勢，亦是吾人所追求的理想。有關建置內容部份：包含魯迅的生平資料、魯迅的作品資料，以及魯迅的前人研究資料等三部份。有關建置方式部

份：學術資料庫網站之建構，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提供讀者瀏覽全文；二是提供研究者尋找所需的資料。因此它須具備有：符合閱讀習慣、簡易、快速，以及方便等四大要件，才能普及大眾需求。只可惜，目前學術資料庫網站之建構，大致皆有如下問題：

1.資料查詢方式：

該等資料庫網站資料查詢皆採初階、進階兩階段查詢方式，並要設定多種條件才能找到所需資料，使用上不符上述：簡易、快速、方便等要件，尤其對一些不太懂電腦的人總是一種困擾。

2.資料呈現方式：

該等資料庫網站資料之呈現，皆以靜態捲軸瀏覽方式，其缺點有四：

A.無緣目睹原始書籍之風采，尤其是孤本或絕版書籍更顯得重要。

B.文字資料是人工打字，難確保資料正確無誤。

C.須面臨罕見字無法呈現的困擾。

D.須改變閱讀方式。

E.引文時因無頁碼等資訊，故須找到原始書籍核對，非常麻煩。

以上這些缺點，讓目前學術資料庫網站之建構，無法滿足：符合閱讀習慣、簡易、快速，以及方便等四大要件，故不是那麼的理想。

據上分析，筆者認為，一個理想的學術資料庫網站，應能提供讀者或研究者一個「符合閱讀習慣、簡易、快速，以及方便」的使用方式，並可置身於一個人性化、智慧化、便捷化，以及講究視聽覺享受的操作環境，讓吾人雖在世界不同的角落，資訊卻唾手可得。茲說明如下：

1.資料查詢方式：

該資料庫採用智慧型搜尋引擎，其資料查詢不分階段，也無需設定條件，只要輸入任一作者、籍貫、書名、刊名、卷期、出版社、出刊日期、關鍵字等資訊，或作者+書名+出刊日期等資訊，皆能快速找到所需資料，使用上完全符合上述：簡易、快速、方便等要件，尤其對一些不太懂電腦的人也像吃飯一樣的簡單。

2.資料呈現方式：

有關資料呈現方式，採與原始書籍一模一樣的動態電子書瀏覽方式，其優點有六：

A.可親眼目睹原始書籍之風采，這對版本學研究者更具意義。

B.呈現資料是原始書籍，能確保資料正確無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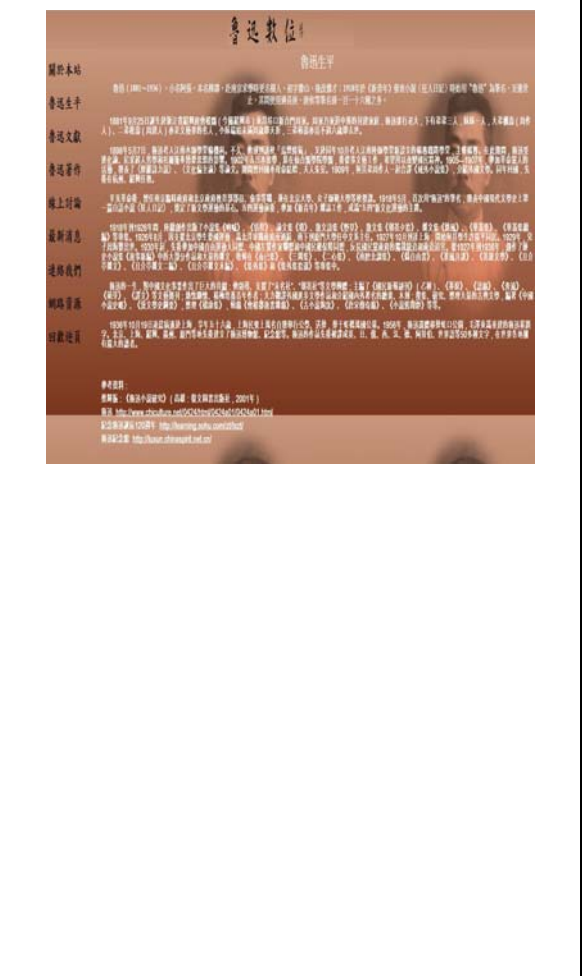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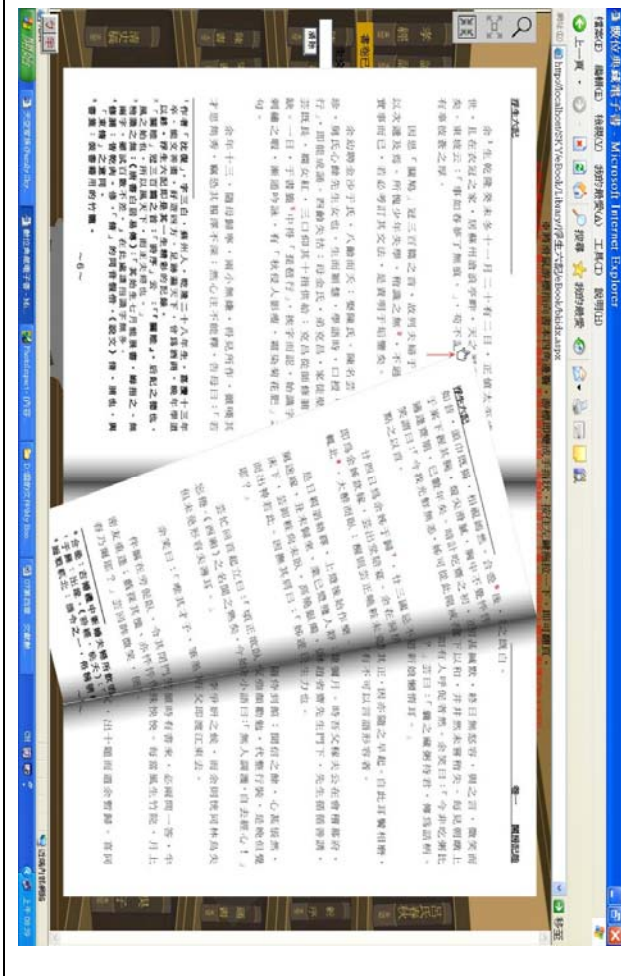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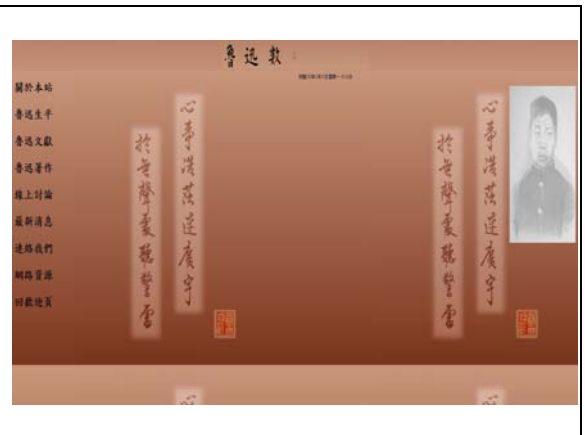
C.沒有罕見字無法呈現的困擾。

D.無須改變閱讀方式，採用“動態電子書”，來模擬原始書籍的狀態來閱讀，翻頁時，游標會變成手指狀來翻頁，亦會產生翻頁的聲音，與傳統閱讀翻頁非常類似。

E.引文時因是原始書籍，故皆有頁碼等資訊，不須再找原始書籍核對，非常方便。

F.具有全文檢索功能。

以上之六大功能，係解決上述之缺點的最佳方法，故筆者認為，未來的學術資料庫網站，應朝向這種模式去發展。有關建置範例部份：



有關結論部份：當「魯迅數位博物館之建置」完成後，我們將可以置身在一個人性化、智慧化、便捷化，以及講究視聽覺享受的操作環境。儘管我們置身於世界不同的角落，但資訊卻唾手可得，彼此之間也無距離，此乃吾人所追求的理想，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會議結束後，主辦單位並安排參訪行程，鴻爪留泥如下。



與會學者合影



大會召開情況



論文發表一角



與魯迅長孫 周令飛合影



與前北大中文系主任 嚴家其合影



大會主持人

三、心得：

魯迅研究，遍及世界各地，其作品，尤其是〈阿 Q 正傳〉，更風行 30 幾個國家，被翻譯成 10 幾種語言在流傳，魯迅紀念館、魯迅研究會、魯迅之友會等學術團體在世界則到處林立，放眼古今中外，實無幾人。

魯迅在大陸，過去是一門顯學，其研究更是汗牛充棟，以研究其人或作品而獲得博碩士學位者，則大有人在，現在則是慢慢沒落，研究的人越來越少。反觀台灣，在過去相對於大陸卻是寥若晨星，有如一片沙漠，這當然起於是年國共恩怨，台灣當局，遂將魯迅與共產黨畫上等號，其作品自然也成爲禁書，故研究魯迅者寥寥無幾，其書刊資料更是屈指可數。到九十年代後，隨著台灣的解嚴，魯迅作品終能見天，逐漸的，參與研究者便有顯注的增加，以研究魯迅或其作品而獲得博碩士學位者，如今在台灣已大有人在，這是目前海峽兩岸研究魯迅的消長現象。

於大會中各自詮釋個人研究魯迅的心得，相互分享，尤其是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看法，彼此之間借鏡取法，收穫良多，增進國際視野。尤其是「魯迅數位博物館之建置」完成後，對於研究魯迅者，將有很大的助益。本人並被邀爲大會主持人。

四、建議事項：

- 一、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已同意與我所建立學術交流，本所 2014 年所舉辦之國際漢學學術研討會將邀請張院長前來會商細節，便可簽訂交流協議，盼學校能大力支持。
- 二、教學與研究能力的提升，除個人努力外，多參與國際間的交流，彼此借鏡取法有正面的意義，期待有更多的經費讓我們提升素質。